



山大中心校区文史楼前“八大教授”雕塑的一部分

【名家背影】

“鼓扎”是什么——回忆当年听赵俪生先生讲课

□许志杰

前段时间跟山大历史系的徐畅教授一起吃饭，他问我早年在历史系读书的时候，见过“八马同槽”（指上世纪50年代执教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八位著名教授）中的哪一匹骏马。我说见了不少，王仲荦、郑鹤声、张维华、赵俪生、杨向奎几位先生都见过，也听过他们讲课或讲座。想不到这点见识令后来进历史系读书的徐畅羡慕不已，认为我太幸运了，能沐大师之风；也唏嘘不已，感叹先生们走得过早，是中国史学和教育界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时光如梭，当我们还在为先生们走得太早而惋惜遗憾之时，屈指算来，其实，他们倘若尚在人世，都已经是世纪老人。“八马”之中最为年轻的赵俪生先生，今年整整百岁，黄云眉和陈同燮都生于1898年，今年虚岁120啦。

这几天陆续看到一些纪念赵俪生先生百年诞辰的文字，想到徐畅教授所流露出的羡慕与唏嘘，深感自己读书时能够聆听赵先生讲课是多么幸运，当年之场景不时浮现眼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赵先生几乎长住山大了（彼时他还在兰州大学任教），给我们讲了好几次课。具体年月日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，第一堂课大概是198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讲座地点在山大文史楼的201大教室。那是当时历史系唯一一个可以装下100人以上的豪华场所，唐德刚、金冲及、黎澍等名流都在这里讲过课。我到得有点晚，讲座虽然还没有开始，201教室已被学生挤得满满当当。赵俪生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，与讲座主持人王仲荦先生交谈。王先生是南方人，讲话轻声细语，笑容满面。赵先生乃是本省安丘人，虽然少小离家开始走“江湖”，东北、西北、北京诸地都呆过，那一口乡音却是不离不弃，一直跟着他闯天下。

王先生简短的主持词之后，赵俪生先生开讲了。赵先生的第一句话是，今天中午吃的鼓扎。很浓的安丘腔，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。“鼓扎”是什么，恐怕在场的人知道得不多，那是山东潍县东南乡与安丘交界处方圆几十里，人们对水饺的称呼。赵先生的老家是安丘景芝

赵俪生在山大著名的“八马”之中属于会讲课、善讲课、敢讲课的先生，诙谐、幽默，不拘题材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他在讲台上滔滔不绝，听得台下的人时而前仰后合，时而静默沉思……虽然当年听课的主要内容已经淡忘，幸运地回答了“鼓扎是什么”这个问题，却让我记忆犹新。



镇，我家住潍县最南边，一条胶济铁路把潍县与安丘南北分开，但是民间交往并没有因行政区划而中断。两县人民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我的老奶奶、奶奶和母亲，都是从安丘地界嫁到潍县的。接着赵先生问，哪位同学知道“鼓扎”是什么？我赶紧站起来，举手回答：水饺。赵先生是大学问家，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细微深入，尤其是他和夫人高昭先生共同研究农民战争和农民运动史，独树一帜，见解入木三分。能把赵先生的问题回答对了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随着讲座内容的不断延伸，问题肯定会越来越难，机会越来越少。我自豪，抢答了赵先生的第一个问题，而且答对了，尽管题目有点简单。

赵俪生在山大著名的“八马”之中属于会讲课、善讲课、敢讲课的先生，诙谐、幽默，不拘题材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。

他在讲台上滔滔不绝，听得台下的人时而前仰后合，时而静默沉思。他以浓重的乡音牵引着学生百分百的听力，在他浩瀚蓬勃的思想海洋里，学生像一群小鱼，跟着他畅游畅想。凡是听过赵先生讲课或讲座的人，无不记忆深刻，总有一句话、一件事让你永不忘记。如我便是，虽然当年听课的主要内容已经淡忘，幸运地回答了“鼓扎是什么”这个问题，却让我记忆犹新。

赵先生讲课“有意思”，学生爱听，除了他直率的性情、一身的傲骨，还可能与他广泛的爱好有关。“八马”中，他和杨向奎、童书业以及历史系著名教授卢振华，都是山大著名票友，只要有戏，“大家一起去，互相请客”。他和童书业先生又是功底不凡的书画家和书画鉴定家，童先生不收藏，但赵俪生却收了不少好东西，经常和童先生一起品论。

后来听说赵俪生先生要从兰州大学调回山大历史系，因为赵先生是1957年被调到兰州大学历史系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初在山大任教的七年，是赵俪生事业、学术、人生、家庭最为顺遂的日子，虽然受到过批判，但并未戴上很具体的哪项帽子。“文革”结束，落叶归根，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回到他与同事们一起创造了辉煌的山大历史系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但赵先生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据说原因很复杂。

“八马”中只有赵俪生和杨向奎两位先生不是终老于山大历史系。杨先生与赵俪生同年离开山大，去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（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），2000年在北京去世，享年90周岁。

山大百年诞辰之前，一组“八大教授”的雕塑在山大中心校区文史楼前落成，失散多年的“八马”得以重新“同槽”，继续着他们曾经的学术辉煌，向人们讲述着过去那些好听的故事。“小弟”赵俪生一身正装，肩上搭着一条时髦的围巾，英气勃发，那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他在山大历史系常有的装束……百年俪生，依旧年轻。

（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）

【人生随想】

试将人生除以七

□肖复兴

曾经看过一部英国纪录片《56UP》，看后颇不平静。这部纪录片，拍摄了来自伦敦的14个同龄人的生活之路。导演每七年拍一次，自他们7岁开始，拍了八次，拍到56岁，150分钟的影片，他们就从童年进入了老年，逝者如斯，让人感喟。

我不想谈论这部纪录片的主旨。让我感兴趣的是，它选择了将人生除以七的方式来演绎并解读人生。我也想将过往岁月除以七，看看有什么样的变化。

不从7岁，而从5岁开始吧。因为，那一年，我的母亲去世，人生的记忆也就从那时开始。那年初夏，院子里的老槐树落满一地槐花如雪，我穿着一双新买的白力士鞋，算是为母亲穿孝。母亲长什么样子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，只记得姐姐带着我和两岁的弟弟到劝业场的照相馆照了张全身合影，特意照上了白力士鞋。此后，她便到内蒙古修铁路去了。那年，姐姐17岁。

七年之后，我12岁，读小学五年级。用节省下来的钱，买了人生第一本书，一角七分钱的《少年文艺》，并从中第一次读到小说，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《马戏团来到了镇上》。马戏团来到偏僻的小镇。两个小兄弟没有钱买入场券，帮助马戏团把道具搬进场地，换来了两张入场券。好不容易等到第一个节目，但小丑刚出场，小哥俩就累得睡着了。小说里的小哥俩，让我想起了我和弟弟，也让我迷上了文学。我开始偷偷地写我们小哥俩的故事。

19岁那年的春天，我高中毕业，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。然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，大学之门被命运之手关闭。两年后，我去了北大荒，把那张夹在印有毛体“中央戏剧学院”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撕掉了。

26岁，我在北京郊区当了一名中学老师。那时我已回京一年，是因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，我才被退回京的。熬过了近一年待业的时间，才得到教师这个职位。和父亲一样，我也得了高血压，医生开了半天工作半天休息的假条。每天下午，我骑着自行车回家，写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取名《希望》。在那没有希望的年头，小说的名字恶作剧一样，有一丝隐喻色彩。

33岁，我“二进宫”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二年级。那年，我有了孩子。孩子出生前，我在南京《雨花》杂志社修改第一篇报告文学。回家的第二天，孩子呱呱坠地。

40岁，不惑之年。那一年，上海《文汇报月刊》杂志封面要刊登我的照片，并要立刻寄去。我下楼借来一台照相机，带着儿子来到地坛公园，让儿子帮我拍了照片，寄去勉强用了。那时，儿子8岁，小手还拿不稳相机，拍照时晃晃悠悠的。

47岁，我调到了《小说选刊》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从大学老师到《新体育》杂志当记者，几经颠簸，终于来到中国作协这个向往已久的文学殿堂。前辈作家艾芜和叶圣陶的孩子却都劝我三思而行，说那是名利场。

54岁，新世纪到来。我乏善可陈。两年之后，儿子去美国读书，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，后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，都有奖学金，是他的骄傲，也是我的虚荣。

61岁，大年初二，突然的车祸，摔断脊椎，我躺在天坛医院整整半年。家人朋友都说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相信他们说的，我也开始相信命运。祸福相依，我想起在叶圣陶先生家中曾经看过的先生写的那副对联：得失塞翁马，襟怀孺子牛。

68岁，我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旁边儿子的房子里小住，两个孙子，一个两岁半，一个5岁，生命的轮回，让我想起儿子小时候，却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小时候的样子。

人生除以七，竟然这么快，就将人生一本大书翻了过去。《56UP》中有一个叫贾姬的女人说：尽管自己是一本不怎么好看的书，但是已经打开了，就得读下去，读着读着，也就读下去了。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人生除以七，在生命的切割中，让人容易感觉到人生的速度，体味到时间的重量。（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）